

新诗坛的第一部讽刺诗集

——评任钧的《冷热集》

王祖铨 王建华

在现代文学中，新诗一直以其新颖丰富的内容和独特的形式展现在我们面前。为新诗的发展作出贡献的诗人任钧是值得我们去研究和评价的。

《冷热集》是现代著名诗人任钧的代表作。集中所收讽刺诗25首，均作于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编辑出版于抗战全面爆发前夕的1936年末。这一时期，我国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日趋激化，国内革命势力和反革命势力的斗争达到白热化程度，人民要求抗日的呼声日益强烈。面对严峻的现实，1932年在“左联”领导下成立于上海的“中国诗歌会”，扛起战斗的大旗，在会刊《新诗歌》创刊号上明确提出自己的主张：要求诗歌与社会生活联系得更为紧密，号召作家“捉住现实”，反映“压迫、剥削，帝国主义的屠杀，反帝、抗日，那一切民众高涨的情绪”。

中国诗歌会发起人并作为主要骨干之一的任钧，用讽刺诗的创作实践了诗歌会的文学主张。任钧认为新时代所需要的是“那些富有时代精神，能够推动社会的诗歌。”^①从事新诗创作的开始，他就一直寻找使新诗和社会生活结合得更为紧密、更为广泛的途径；通过开拓新诗领域的实践，使之更适合表现时代精神及其特点。从这个意义上说，《冷热集》的产生是三十年代初期革命斗争的需要，是作者对于时代要求的感应。另一方面，任钧的文学修养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熏

陶，以及外国诗人，如德国的海涅、苏联的别德内伊等人的艺术风格的影响。他推崇白居易和别德内伊的诗，一再强调诗歌应干预生活，讽喻时弊。这样的文学主张和修养使他有别于其他诗人，率先在新诗坛百花园中培植出另一株奇葩——讽刺诗。回忆讽刺诗的创作缘起，任钧说：如果“抒情诗表现了我的爱”，那么“讽刺诗就表现了我的憎”；对黑暗的社会“憎恶到了极点，用讽刺诗表现更好”^②。因此，他的讽刺诗创作乃是其文学主张的新尝试。由于这个缘故，作者在创作初期曾谦虚地说，他写下的是否是真正的讽刺诗，也不敢有什么自信。^③

然而，“判断历史的功绩，不是根据历史活动家有没有提供现代所需要的东西，而是根据他们比他们的前辈提供了新的东西”^④。无怪乎，《冷热集》一出版，就受到当时诗坛乃至文学界的极大关注。著名文学评论家阿英首先撰文评介，认为《冷热集》的发表，是“一件极可嘉的事”，是“一种新的开拓”。他说：“这部诗集，将实际地成为中国新讽刺诗的奠基石。”^⑤紧接着蒲风发表了《评任钧的〈冷热集〉》，更明确指出，“作为中国新诗界的讽刺诗的尝试，任钧的《冷热集》无疑已为中国讽刺诗造了基础。”他对任钧及《冷热集》作了热情的赞扬，说：他的“功绩已永不磨灭。……对于这册第一册的中国的讽刺诗集，我感到满意”^⑥。几乎与蒲风同时，诗人雷石榆也撰文，谈他读《冷热集》的感想，“说到现在中国的讽刺诗，我以为

应该最先把‘任钧’这位诗人提出，因为他写讽刺诗已远在五年前。虽然他的生产不多，但他的创作过程，已证明他是一贯的专写讽刺诗而努力着的诗人了。……目前中国的诗人之中，倾向于写讽刺诗的似数不出两三个，而专写讽刺诗的，除任钧之外，似无一人了。……任钧不愧为中国的一个有力的讽刺诗人。”^①

从以上几位文学界和诗坛著名人士的高度评价和对讽刺诗的发展前途所寄予的殷切期望，可以看出：作为新诗坛的第一部讽刺诗集——《冷热集》对当时文坛的影响和对新诗歌发展所作出的贡献。但是，由于多方面的原因，特别是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绝大多数革命文艺工作者从文艺战线转入具体的实际抗日工作；此后数年里，《冷热集》及讽刺诗的创作未能引起更广泛的注意。其间，只有蒲风在1938年2月出版过讽刺诗集《黑陋的角落里》。从此直到“延安文艺座谈会”后，才产生了袁水拍的《马凡陀的山歌》这部影响较大的讽刺诗集。

追根溯源，讽刺诗这一文学形式尽管由来已久，在《冷热集》之前的新诗创作中也并不乏先例；但专门用新诗形式描绘讽刺对象，起到讽刺功能，并成集出版的，《冷热集》是第一部。在新诗坛中，我们找不到比它更早的同类诗集。然而，《冷热集》在现代文学史上却被忽视了，没能显示其应有的地位。解放以来，连“文革”后重新编印，作为大学文科教材的各种版本的《现代文学史》都未对它作出评介，以致大学中文系的毕业生错将袁水拍的《马凡陀的山歌》当作中国新诗坛上第一部讽刺诗集。

二

《冷热集》是一部政治讽刺诗集。诗人依靠敏锐的政治嗅觉，把笔触伸向群众最为关切的领域，以通俗的形式揭示了三十年代初期的斗争风云和光怪陆离的社会现实，实践了他文学应“是社会和人生的反映”，应为

现实斗争服务的文学主张^②。

任钧善于将国际上重大的政治事件作为讽刺题材。抗战全面爆发前夕，国内救亡运动已蓬勃兴起，因而，“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主题在《冷热集》中占有重要地位。

《感谢墨索里尼》、《黑衣宰相的焦躁》、《他们不是强盗》诸篇，作者满腔愤怒地揭露了帝国主义的侵略带给人民的重重灾难。诗中称侵略者为“专门使用枪炮来传播文化的‘文明人’”，他们用飞机、坦克、毒瓦斯、达姆弹践踏别国领土，屠戮他国百姓；他们以人民的血肉，渲染自己的“勋劳”，巩固自己的“宝座”。饱含笔端的是作者对惨无人道的帝国主义的痛恨和对被侵略民族的同情。

作者在剖析帝国主义对其他民族侵略行径时，还注意从多侧面的更深的层次上进行发掘和揭露。《欢迎！一九三六！》一诗，将军火商迫不及待地希望战争早日到来的复杂心理刻画得淋漓尽致。诗人尖锐地指出，战争最终的获益者是美帝国主义军火商，这一点也被二次大战的历史所证实，表明了作者具有敏锐的洞察力。《黑衣宰相的焦躁》则揭示了帝国主义对外侵略的最主要原因是转嫁本国的经济危机。

侵略者的手法常常是大棒与橄榄枝交替使用，这种表演更有欺骗性。《冷热集》中有好几篇对此作了无情的暴露和有力的嘲讽。这类诗竭尽其讽刺之能事，更能体现作者的风格。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是《“和平的白鸽”——麦克唐纳》和《李顿爵士微笑着》。前者是一首叙事性长诗，记叙了麦克唐纳以和平使者的面目去罗马、巴黎游说的经过，揭示了帝国主义侵略者之间勾心斗角，争权夺利，妄图重新瓜分世界的丑恶内幕。后者以黄脸奴才的膜拜、赞美，胡佛的赏识，麦克的敬佩，一针见血地点出了李顿微笑所包藏的祸心是：“共管中国”和“进攻苏联”。

揭露帝国主义，让人民认清其反动本性，是诗人的重要任务；增强斗志，鼓舞人

民反对它们的侵略，更是诗人的神圣职责。任钧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始终贯穿于他的诗篇。在《黑衣宰相的焦躁》中，身处绝境的法西斯头子不得不担忧：“十多年的王座这回真要坍倒”；在《希特勒的诧异》中，希特勒总理也出乎意料地看到埃塞俄比亚人民的“英勇奋斗”和“抗战勇气”。

《冷热集》的另一重要内容，是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黑暗统治及其卖国政策，揭露他们对外投降帝国主义、对内镇压革命人民的罪行，表现了作者对当时现实生活深入的探索和认识。诗人希望民族独立，不做亡国奴的进步思想在诗中得到鲜明反映。

作者给卖国贼以无情抨击。《将军还乡》、《将军的晚祷》等篇表现了这类主题。《将军还乡》通过母子俩对话的形式，以家乡人民对将军母亲前后态度的对比描写，表现了充当汉奸不得人心的诗的主旨和人民鲜明的爱憎感情。《无题》则塑造了一个“慷慨大方”的卖国贼丑恶形象。诗的结尾部分特别犀利，入木三分：

……

哎哟，邻居，真没有想到：
你如今还在对我的后院打主意！
啊啊！你真太不顾友谊！
啊啊！你真太不讲道理！
但无论如何也得请你稍等一会：
你看，我的瘾还没有过足，
怎能坐飞机！
你看，一切细软还没有收拾好，
怎能马上逃去！
邻居，无论如何也得请你稍等一会！

有些诗篇毫不留情地撕下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假面具，暴露出他们那不可告人的投降卖国的真面目。揭露“不抵抗”政策的《我们的夸耀》，把他们将大片国土奉送给日本帝国主义的无耻罪行绘声绘色地作了详尽描述，使汉奸卖国贼的嘴脸跃然纸上。《大刀的记忆》揭示了国民党顽固派假抗日真反共

的实质。“大刀”原以为杀敌的机缘又来临，可睁眼一看，“这那里是什么敌人？/还不是些自己的同胞！/这哪里是什么敌兵？/还不是些学生和民众所形成的人潮！/看呀，他们一个个还擎着抗战旗帜！/听呀，他们一个个还喊着抗敌口号！”啊！原来国民党反共顽固派的屠刀正高举在人民头上，横架在爱国者的脖子上。

《冷热集》里，除上述题材外，还有一些是针对当时社会上存在的消极面的作品。如《古国》里描绘了一些“伟大的学者和名家”，他们“能够在轰隆的大炮声里，/能够在敌国的飞机底下；/照常标点古书，照常写作幽默小品，/照常吟咏花呀，月呀，我的小亲亲呀……/照常悠然地游山玩水，/照常在看斋里喝苦茶……/一句话，他们能够在尸城血海里面；/照常恬静闲适，照常飘逸风雅！”再如在《春天到了》中，也写出了某些人只图自己的逸乐，不顾千万人的苦难的内心独白：“春天到了，/朋友，且让我们来把春花欣赏！/说什么灾民千万，说什么到处春荒！——/这全是些不相干的闲账！”你瞧，这是何等的麻木不仁，何等的醉生梦死！然而，这正是当时反动统治下百分之百的客观现实！

三

讽刺诗和抒情诗有所不同，在艺术表现方面也有其自身的特点。《冷热集》正是任钧所要求的“在创作活动中去征取崭新的技巧”的收获^⑩。

诗人擅长从社会生活中提炼场景，运用“漫画”手法，寥寥数笔就勾勒出讽刺对象的实质。这是其艺术表现上的主要特色。《公平的判决》截取一次庭审判决中“华人旁听席”和“西人旁听席”所表现出不同反应的场景，象一部独幕讽刺诗剧，揭示了在帝国主义统治的租界，外国人杀人不偿命的所谓公正的法律的实质。全诗文笔洗炼简洁，没有议论，却使我们感受到作者强烈的义愤，

收到了讽刺和鞭挞的效果。另一首被阿英誉为《冷热集》讽谕诗代表作的《将军还乡》也与此诗有异曲同工之妙。

有些诗在描绘的同时加上议论，两者相得益彰。如《中国人的命运》，先描述生活场景：一个病丐被外国巡捕活活扔进河里淹死。最后一段摹拟租界里帝国主义的口气，加以议论，点出了全诗的题目：“难道对待中国人，/而且又是对待中国乞丐，/也顾得到什么人道不人道吗？”吃了人还要发表一通“高论”，一个杀人魔鬼的嘴脸活现在我们的眼前。这样的议论正表现出讽刺诗的特色，如果由作者本人直接发议论，那就将失去讽刺和鞭挞的作用。与这一篇写法类似的还有集中篇幅最长的一首《将军的碗裤》，不同的是，它以叙述为主，夹叙夹议，其中有“讽”，也有“谕”。

可贵的是，作者在描绘人物时还能抓住对象瞬间的表情，由表及里地揭示敌人的阴险内心。《李顿爵士微笑着……》就是一篇成功之作，李顿是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受当时“国际联盟”的派遣，率领调查团来华的帝国主义分子。他打着“公正”的旗号，干着出卖中国利益、敌视苏联革命政权的罪恶勾当。诗人突出了他那“微笑着”的特写镜头，反复渲染。在揭露他“微笑”的每一个原因之后，都用了“我们的爵士哪能不微笑？……”加以嘲讽，刺破了他“微笑”的表象，暴露了帝国主义分子狡诈的野心。阿英说：“这首诗在‘暴露’中有含蓄，在‘暴露’中有‘讽谕’，写作的技术也足以副之。我想：如以这首诗来作为《冷热集》的代表，也是没有什么不可以的。”^⑩此外，写作方法和讽刺角度与这一篇类似的《“和平的白鸽”——麦克唐纳》也不失为一篇耐人寻味的佳作。

摹拟讽刺对象的口吻，让他们不打自招、自我表现，构成了《冷热集》另一艺术特色。这对表现抽象的思想和意念，收到了运

用其它方法所不能替代的效果。作者改变讽刺角度，运用“他人有心，余揣度之”的写法，将讽刺对象推到台前，通过其内心独白达到自我暴露的讽刺目的。如讽刺国民党反动派“不抵抗主义”和“卖国有理”的《我们的夸耀》、《活该》；揭示帝国主义军火商渴望发战争财心理的《欢迎！一九三六！》等数篇都是用这种写法的。

请欣赏《我们的夸耀》中的一节：

我们是个爱好和平的民族——
人家任意践踏、屠杀我们，
我们可以始终不还手；
人家侵犯了我们的主权，
人家强抢了我们的领土，
我们也能够爱好和平如故。

圣书上说——

“人家要抢你的外套，
你就把衬衫也脱给他；
人家要打你的右颊，
你就连左颊也给他打。”

我们却除开衬衫之外，
还肯把衬裤也脱给人家！

除开左颊之外，
还肯把屁股也给人家打！

一句话：

我们只晓得爱好和平，
不晓得还有其他！

明白如话的诗句，无须任何提示和注释，就把卖国贼的丑恶灵魂赤裸裸地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这比正面揭露更为犀利，更富讽刺力量。

《欢迎！一九三六！》写得更加酣畅淋漓。诗人运用拟人化的手法，把一九三六年化成了帝国主义军火商眼里的情人，又配以向恋人求爱的语气，将他们迫不及待地想利用世界大战坐收渔翁之利的心理维妙维肖地表现了出来，达到了含蓄中尽情暴露，幽默中无情鞭挞的艺术效果。

《冷热集》的又一艺术特色就是“形囊实

贬”的讽刺手法。作者故意站在讽刺对象的立场，运用反话，以肯定语气对他们的罪行或赞扬，或辩解，让读者从反面去认识他们的真面目。《导演赞》、《感谢墨索里尼》、《他们不是强盗》诸篇均具有这种艺术特点。如在《导演赞》中，作者通过“称赞”日本帝国主义者所导演的一幕幕丑剧，使他们企图吞并中国的虎狼之心昭然若揭：“少将，不，导演哟，努力吧！/支那是一个大好舞台，/出色的演员更是如泥似沙；/他们一定可以绝对听你老指挥，/好让你老变成东洋最高明的导演名家！”通篇反话，主子奴才都受到辛辣讽刺。

除了上述这些表现手法上的艺术特色之外，《冷热集》中的诗篇在遣词造句方面运用了当时民众易读易懂的大众化的形式。这就构成了这部诗集在语言表达上的特色——通俗易懂，明白如话。有些诗在篇章结构上反复吟咏，重章叠唱，令人想起《诗经》中某些脍炙人口的诗篇。这是诗人继承和发扬中国现实主义诗歌创作的优良传统，古为今用的结果。

不过，毋庸讳言，《冷热集》某些篇章也存在着因过份追求大众化、通俗化而使诗意不够含蓄的缺陷。作为新诗坛的新生儿，《冷热集》毕竟是跨出了它坚实的第一步。正如诗人雷石榆所评论的那样：“任钧是不愧为中国的一个有力的讽刺诗人，虽然还部分地含有某些缺点，但那缺点也仅是他长征中的后尘。《冷热集》已是他完成第一个备有自来水龙头的‘温泉汤’，当然，无数的大众还期待着建设更大的澡堂，给秽垢的人们冷热兼施地沐浴沐浴吧！”^⑩

× × × ×

据我们所知，作为诗人，任钧除写作抒情诗外，一直没有放下讽刺诗笔，不妨说是在两条战线上作战。解放前所作除《冷热集》所收之外，其余的都陆续地收在抗战前或抗战胜利后印行的诗集里，如《为胜利而歌》和《任钧诗集》等。解放后他也照样并未忘情于讽刺篇章的创作。特别是近几年中，他还和漫画家詹同合作，搞了些“诗画配”，陆续发表在《漫画世界》等报刊上。

阿英同志在《评任钧的讽刺诗》中，曾说过如下一段话，“对于《冷热集》的出版，我是感到非常欣慰的。我敢于预言：中国的新讽刺诗，将因此书的产生而广泛的得到开展。……许多的诗人，将突破他们固有的范围，走向这一块新的草原，更有力的在政治上完成作为新诗人的任务。”

鉴于其后不久，中国新诗坛上，蒲风、袁水拍（马凡陀）和臧克家等不少诗人也陆续“走向这一块新的草原”，应该说，具有远见的文学批评家、评论家阿英的预言业已成为现实。

①⑧任钧：《谈谈诗歌写作》（《新诗话》第136页）

②一九八八年四月与任钧的谈话记录。

③任钧：《冷热集·编后的几句话》。

④列宁：《列宁全集》第二卷第·160页

⑤⑩阿英：《评任钧的讽刺诗——介绍中国第一本讽刺新诗〈冷热集〉》（《笔》第一期1946·6·20·上海大同出版公司出版）。

⑥蒲风：《蒲风选集》第712页。

⑦⑪雷石榆：《任钧的讽刺诗——读了〈冷热集〉的感想》（1937年上半年《福建民报·艺术座》）。

⑨任钧：《关于新诗的路》（《新诗话》第209页）